

国家社科基金
后期资助项目

李维史学研究

蔡丽娟 著



创立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4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维史学研究/蔡丽娟著.—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ISBN 978-7-100-09176-3

I.①李… II.①蔡… III.①古罗马—史学理论—
研究 IV.①K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30476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李维史学研究
蔡丽娟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9176-3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4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2 3/4 插页 1
定价:38.00 元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第一门的奥古斯都塑像

序

黄 洋

李维的《罗马史》堪称古代世界的巨著。全书共 142 卷,若以现代书籍换算,几达万页,或约近 20 册。然而其之所以成为巨著,更在于它记叙了从罗马建城直至作者所生活的时代长达七百多年的历史,是罗马史学中最为重要的著作。李维的著作拉丁文原名为 *Ab Urbe Condita Libri*,意为《建城以来书》。以编年史的体例,记叙罗马建城以来的历史,是罗马史学的传统。公元前 3 世纪末,古罗马的第一位史家法比乌斯·匹克托(*Quintus Fabius Pictor*)用希腊文撰成第一部罗马史,即为“建城以来史”体例,记叙从罗马建城至第一次布匿战争(迦太基战争)的历史。公元前 2 世纪前期,罗马诗人昆图斯·恩尼乌斯(*Quintus Ennius*)创作多达 18 卷的长篇拉丁文史诗《编年纪》(*Annales*),叙述从埃涅阿斯到作者时代的罗马历史。罗马政治家、曾经担任执政官和监察官的老加图(*Marcus Porcius Cato*)曾撰写 7 卷《创始记》(*Origines*),追述从起源直至作者晚年(约公元前 150 年)的罗马历史。但他们的著作业已散佚,仅留下残篇。李维承继了罗马史学的这个传统,而成为集大成者。其著作现存第 1~10 卷和第 21~45 卷,前 10 卷从建城写到公元前 292 年,第 21~45 卷则从第二次布匿战争开始(公元前 218 年)写至公元前 167 年。和李维同时代的希腊史家兼演说术教师哈利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曾撰 20 卷《罗马古代史》,记叙从传说时代至第一次布匿战争开始(公元前 264 年)的历史,但只有前 11 卷比较完好地保存下来。公元前 2 世纪的希腊将军兼史家波利比乌斯(又译波里比阿)撰《通史》,记叙从公元前 264 年至前 146 年罗马崛起为世界性帝国的历史,但也只有前 6 卷保存比较完整。李维的《罗马史》可以和这两部史书相互补充和验证,构成了研究罗马王政和共和时代历史所必不可少的史料,有时候甚至是唯一的史料。

大多数的罗马史家都是官员出身,著史立说似乎是他们表达政治立场和观点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他们政治生涯的延伸和延续。极力宣扬

罗马文化的老加图着力勾勒意大利诸民族是如何融合而成为罗马民族的。略早于李维的公元前1世纪元老兼新非洲行省(Africa Nova)总督萨鲁斯特(Gaius Sallustius Crispus, 又译撒路斯特)先是被短暂逐出元老院, 后又因腐败指控而被迫退出政坛。之后他著《喀提林阴谋》和《朱古达战争》, 一反罗马史学传统, 以纪事本末体记叙当时的两个事件, 描绘了一幅罗马走向道德沦丧和衰落的画面。李维则不同。他从未涉入政坛, 从小在家乡——意大利东北部的巴都亚(Padua, 即帕多瓦)——接受教育。这里属于山南高卢行省, 被罗马人看成是落后的乡下。在《罗马史》发表之后, 曾有人讥讽李维的语言为“巴都亚土话”(Patavinitas)^①。但其实山南高卢行省早已罗马化, 在文化上属于比较先进的地区。略早于李维的著名诗人卡图卢斯(Gaius Valerius Catullus)出生于山南高卢行省的维罗那(Verona); 罗马最伟大的诗人、和李维同时代的维吉尔同样出生于这个行省的曼图亚(Mantua)。约30岁时, 李维开始撰写他的鸿篇巨制, 直至晚年方大功告成。可以说历史书写是李维的生命。因为身处政治旋涡之外, 他不受政治情势的羁绊, 而能够以一位历史学家的眼光直书情怀。他秉承希罗多德开创的史学传统, 以记载历史为最重要使命。在前言中他写道:

在罗马建城或即将建城之前的事情是诗歌所歌颂的故事, 而不是确凿可证的史实, 我将既不予肯定, 也不予否定。^②

饱受科学史学浸润的现代史家或许会吃惊于李维的这种态度, 因为他们坚信, 史学的目的是记载客观的、真实的历史。然而李维的态度恰恰是历史主义的和“同情的理解”。他进一步解释说:

应该容许古代人将人事与神事混杂在一起的做法, 它增添了诸城起源的荣耀。如果一个民族可以将其起源神圣化, 归之于神的权威, 罗马人在战争中获得的荣誉如此之大, 因此当他们说马耳斯神是他们和他们建城者的祖先时, 诸族的人们也可和他们接受罗马的统治一样, 大度地接受这种说法。但是无论人们怎样看待和评判这类的传说, 我个人并不看重。^③

在此一位历史学家开放的态度跃然纸上, 难怪古人即有萨鲁斯特是罗马的

① Quintilian, 1, 5.56.

② Livy, Praefatio, 6.

③ Livy, Praefatio, 7.

修昔底德,而李维是罗马的希罗多德的说法。^①

然而李维也深受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影响。他历经了罗马共和国走向崩溃的最后岁月,也见证了奥古斯都的元首政治。和萨鲁斯特一样,李维深切地感受到了共和国末期的道德沦丧:

我提请读者尤其关注下列问题:我们的祖先们是如何生活的,他们有着怎样的道德情操;是什么样的人,在内政和战争中采取的什么样的政策,我们的帝国得以建立并扩大。然后随着纪律的逐渐松弛,道德的基础开始沦陷,接着日益下降,最终整座大厦塌陷,直至今天的时代,我们既不能忍受我们的邪恶,亦无法接受必要的矫正措施。^②

但萨鲁斯特未能见证奥古斯都带来的转机,因而充满悲观情绪。李维则坚信罗马能够重现昔日的辉煌。他开出的良方是回顾过去的历史,用昔日道德情操的楷模改造现时的社会:

历史研究的益处在于所有的榜样都记载于一座显耀的大厦之上,你能从中选择你和你的国家模仿的对象,避免其开端和结果都可耻的例子。如果不是对自己选择的主题的热爱蒙蔽了我,那么可以说没有哪个国家比罗马更伟大、更严守道德、更富有良好的榜样;也没有哪个国家如此之久没有受到邪恶、贪婪和奢侈之风的侵蚀,清平和节俭如此受到尊敬。的确,财富愈少,贪婪愈小。晚近以来财富带来了贪婪,过度的欢愉带来了恣意妄为的欲望,几近于毁灭自我和一切。^③

因而对李维来说,历史的主要作用是垂训后世的人们。他和修昔底德一样(无疑也是受了他的影响),相信历史上可能重复发生类似的事情。^④因而,人们总是可以回到历史中寻找指引。而在他看来,罗马最需要的是道德指引。因此,他的《罗马史》中充满了一个个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历史人物,他们体现了罗马人的勇敢(*virtus*)、虔诚(*pietas*)、仁慈(*clementia*)等。公元

① Quintilian, 10,1.101.

② Livy, Praefatio, 8~9.

③ Livy, Praefatio, 10~12.

④ 学者们相信,Livy, 28,41. 13 借法比乌斯之口所说“发生过的事情可能重复发生”是呼应了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22.4 所表述的历史思想。例如见 Barbara Saylor Rodgers, “Great Expeditions: Livy on Thucydides”,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 116 (1986), pp.335~352.

前 27 年,罗马元老院授予奥古斯都一面称为“勇敢之盾”的黄金盾牌,悬挂在恺撒修建的元老院(*Curia Iulia*)里,上面刻有代表奥古斯都品德的“勇敢”、“仁慈”、“公正”(iustitia)和“虔诚”四个拉丁文词语。很显然,李维着力刻画的罗马人的理想品格和奥古斯都所倡导的时代精神是不谋而合的。然而并不能因此就断定李维是御用历史学家,事实上《罗马史》中除了肯定亚克兴之战后奥古斯都“在大海和陆地上恢复了和平”^①之外,并没有刻意奉承后者的书写。毋宁说,对罗马的热爱和奥古斯都带来的复兴希望是李维历史书写的精神支柱。其字里行间透露出的“爱国主义”也是其著作的恒久魅力所在。

若以现代历史学的眼光来看,李维的《罗马史》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很难说他完全遵守了客观真实的原则。虽然李维充分利用了罗马仅存的一些早期史料,参考了之前的史家的作品,其罗马史的大体线索是可信的,但许多的情节其实都是借自希腊和罗马的史学乃至文学传统。对此其实不难理解。虽然自希罗多德之后,历史书写就成为了一个专门的门类,但希腊罗马人观念中的历史书写,和脱胎于 19 世纪兰克史学的现代历史学仍存在很大差异。历史是以记叙过去发生的事为目的,但却非全然按照现代史学的客观标准,历史和文学并不是截然分开的。重要的是,李维的《罗马史》不仅是研究罗马历史的关键史料,而且是我们走近罗马人生活和观念世界的一个重要门径。

李维《罗马史》的宏大篇幅常常令研究者望而却步,其涉及的问题的复杂性也令人生畏。时至今日,国内尚无完整的中译本,也没有系统研究的成果问世,不能不说是学界一大憾事。令人欣慰的是,蔡丽娟这本《李维史学研究》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内研究的空缺。她在攻读博士学位时,选取李维史学作为研究课题,克服重重困难,潜心研究数载,终于取得初步成果。之后又经过数年的深化和修改,才有了呈现给读者的这部著作。它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李维史学的著作,对李维史学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是值得称道的事。毫无疑问,面对这样一个宏大课题,作为我国学者系统研究的初步尝试,本书所涉及的一些问题仍值得进一步讨论。但学术无止境,它标志了一个良好的开端。笔者期待,本书将会激发我国学者对李维史学乃至罗马史学的进一步研究。

^① Livy, 1, 19.3.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李维生平与创作	13
一、生平	13
二、《建城以来史》文本流传和内容结构	17
三、关于开始写作时间的争论	23
第二章 罗马史学起源和特征	33
一、“祭司表”与“年代记”	33
二、希腊史学的影响	38
三、公元前2世纪之前的罗马史学	49
四、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史学	54
第三章 李维的史学思想	69
一、“范例”史学	69
二、道德史观	80
三、循环史观	92
第四章 李维的史学方法	103
一、“年代记”体例	103
二、史料及其运用	106
三、文学手法	127
第五章 李维史学与奥古斯都时代	140
一、奥古斯都的统治	140
二、奥古斯都时代的文学与艺术	149
三、李维与奥古斯都时代	156
结语	173
余论:李维史学的历史地位	180
引用文献	187

绪 论

古罗马历史学家提图斯·李维(Titus Livius,公元前59~公元17年)毕其一生成就了史学名著《建城以来史》。李维是第一位完整记载罗马历史的人,《建城以来史》关于罗马早期历史的记载被完整保留到今天,成为研究早期罗马历史不可或缺的材料。^① 对于李维记载的罗马早期历史的史料价值,意大利历史学家莫米利亚诺(Arnaldo Momigliano)这样评价道:“如果你不相信李维关于罗穆卢斯^②的说法,那就意味着你无法了解任何关于罗穆卢斯的事情。”^③

然而,李维作为历史学家的声誉和地位不及他之前的撒路斯特(Gaius Sallustius Crispus,公元前86~前35年)和之后的塔西佗(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公元56~118年)。撒路斯特的历史被看作是罗马共和国后期贵族腐败带来政治危机的批评书,塔西佗的历史被誉为惩治“暴君的鞭子”,两人因为写作风格的简练和悲观情绪迎合现代人的心理需求而被赞誉。李维曾经被认为仅仅是历史材料的编辑者,对罗马历史的道德解释被指缺乏新意和深刻敏锐的历史洞察力而被看作是二流的历史学家。李维自身的缺陷,如没有公职经历,对政治、战争的描述差强人意,以及为了弥补政治军事经历方面的不足而以分析历史事件背后的心理情感因素取代对事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的分析等,都被看作是他缺乏历史感的例证。然而,尽管作为历史学家的地位被批评质疑,李维作为文体家的地位则得到大家的认同。许多学者认为,李维的最大功绩就是第一次把自古以来的罗马历史用优美流利的散文写作成一部完整的作品,特别是《建城以来史》的“前十卷”,可以媲美维吉尔的散文史诗《埃涅阿斯纪》。凭借卓越的文学才能,李维与西塞罗、塔西佗一起被并称为罗马三大杰出散文作家。

^① 本文所引用的古典作家著作版本为洛布古典丛书(Loeb Classical Library)。李维《建城以来史》的文本依据为洛布古典丛书和企鹅丛书版(Penguin Books)。

^② 罗穆卢斯(Romulus),又译罗慕路斯、罗慕洛等,传说中的罗马建城者,也是王政时期的第一个国王。

^③ [意]莫米利亚诺:《现代史学的古典基础》,冯洁音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2页。

对李维历史史料价值的质疑根源于 19 世纪西方学者特别是德国学者对李维所用史料的考察。以客观主义诉求相标榜的兰克学派兴起以后,对李维及其著作的研究多在于史料考证方面。受兰克学派强调史料在历史研究中作用的影响,此时的研究者首先关注的是李维所用的史料,他们的共同特征是把考证史料作为其最终目的,把研究的范围锁定在对李维所用史料的甄别上。以考证李维史料作为研究目标的学派,被称作史料研究学派(Quellenforschung)。这一学派最具成就者包括克洛茨(Alfred Klotz)、尼森(H.Nissen)、索尔陶(Soltau)、威特尔(Kurt Wittle)等。克洛茨认为,《建城以来史》第 30~39 卷中,以波里比阿(Polybius)的《历史》为史料,在李维之前则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① 1863 年,尼森的《对李维历史第 4 和第 5 个“十卷”史料的探寻》(*Critical Inquiries into the Source for the Fourth and Fifth Decades of Livy*)。1910 年,威特尔的《李维历史中的叙述形式》(*Concerning the Shape of the Narrative in Livy's History*)等都是关于李维史料研究方面的代表作。尼森认为,《建城以来史》第 31~45 卷的史料来源于希腊历史学家波里比阿和公元前 2 世纪到公元前 1 世纪的罗马作家。同时,尼森认为,古代历史学家的写作与现代的差别是他们把之前作家的叙述而不是文件和档案等作为史料,李维也是如此。尼森的研究代表史料学派的前沿研究成果。威特尔通过研究李维对波里比阿历史的运用,认为李维在对单个事件的描述上超越了波里比阿,更具有艺术性。同时,威特尔也认为,李维并不关注叙述的连贯性。^②

对于德国早期史料学派的成果,P.G.沃尔什(P.G. Walsh)归纳说:“对李维史料的考察因为古代历史学家自希罗多德开始几乎不明确说明他们所用材料的出处而变得困难。一般来说,只是在对他的叙述进行批驳的时候,或者在暗示所描述的事件有另外一种说法的时候才指出作者的名字;所以,要想确认在一个叙述中引用了哪些作家的叙述是不可能的。就李维所用史料来说,经过一百多年系统研究(特别是德国学者的研究),已经确认了事实和精巧构想之间的界限。已经明确的是第 4 和第 5 个‘十卷’的史料;在第 3 个‘十卷’中,模糊的地方还很多,但是也有许多共识;然而在第 1 个‘十卷’中,可用的信息是模糊不清的,仅仅只能进行一些合理的推测。”^③从沃

① Konrad Gries,“Livian Scholarship since 1940(Continued)”,*The Classical World*,Vol.53, No.3(Dec.,1959),pp.69~74,77~80.

② Jane D.Chaplin and Christina S.Kraus ed.,*Liv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p.2~3.

③ P.G. Walsh,*Livy: His Historical Aims and Method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3,p.114.

尔什的评价可以看出,对李维的史料的研究尽管取得了成果,但同时也遭遇到了瓶颈,因为对李维著作的史料研究本身存在严重缺陷,它必须建立在比对的基础上,而李维引用的相关史料大都没有流传下来,这些缺陷最后导致了曾经鼎盛一时的史料研究迅即衰落。就史料学派萧条的原因,卢斯(T.J. Luce)分析说:“对历史学家史料的研究垄断了李维研究的领域,虽然在他的拉丁语运用和体裁的研究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有价值的著作。但是在兴盛一段时间以后,对李维历史的史料研究开始走向衰微,部分是因为材料的枯竭,部分是因为史料学派内部产生分歧,部分是因为一些人开始质疑他们的研究方法和结果的有效性。”^①

对李维著作的史料研究除了研究方面的困境之外,实际上还影响了李维史学的研究方向。史料研究学派重视对史料的考证,肢解了李维本来自成一体的叙述,没有按照李维的历史本身所有的内在联系来理解他的叙述,导致史料研究学派的学者把李维看成缺乏历史感的人,一个不严谨的历史学家,他随意选择史料,一旦选择了,便机械地运用。这样的看法当然使研究者们对李维本人的思想,特别是他的历史学思想缺乏研究,因为他们认为,李维机械地引用他的材料说明他缺乏内在的历史原则,他作为历史学家的地位应该受到怀疑。

史料学派的困顿使对李维的研究停滞不前,直到20世纪中期,关于李维的学术研究才再度成为热点。这次的研究热潮首先对前一段时期李维研究成果进行检视、反省与整合,研究成果斐然,涌现了一批对李维研究影响深远的学者,如沃尔什、麦克唐纳德(A. H. McDonald)、奥格尔维(R. M. Ogilvie)、布里斯科(J. Briscoe)、卢斯等。与史料研究学派不同,他们扩大了研究范围和视野,不再把研究领域局限在史料考证上。研究工作沿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方面巩固整合史料研究的成果,从而出现对李维著作进行注释的热潮。^②另一方面扩大李维研究的范围和视野,出现了以研究李维的修辞学叙述手法为主的修辞学派,“他们主要关注相互关联的两个领域:体裁和主题。就体裁方面来说,特别关注李维叙述中采用的单元叙述方式,以艺术的方法构建和加工的插曲。”^③体裁的研究实质上是修辞学的研究,主题

^① T.J. Luce, *Livy: The Composition of His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XV.

^② 为李维著作注释的作者有麦克唐纳德(1965年第31~35卷,第36~45卷);多里(T. A. Dorey)(1971年第21~22卷);奥格尔维(1973年第1~5卷);布里斯科(1973年第31~33卷);奥克利(S. P. Oakley, 1997年第6~10卷)。

^③ Gary B. Miles, *Livy: Reconstructing Early Rome*,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2.

的研究实质上关注具有主导地位的思想,这些思想连接起来了单个插曲,为全书或者一个独立的部分提供一个共同的主题。这两种方法尽管不同,但也有许多共同之处。修辞学派尽管自身也存在缺陷,但是它的产生则源于看到史料派的缺陷。他们避开对史料的研究,从李维的叙述手法和技巧来论证李维在文学方面的独创性和杰出文学成就。这一学派最有影响和最多成果的人是学者埃瑞克·伯克(Erich Burck)。伯克承袭的是威特尔的研究方法,对《建城以来史》的第1~5卷和第21~30卷进行了研究,认为李维在构建大的叙述场景方面具有卓越才能,肯定李维的文学天才。伯克研究发现,李维就像奥古斯都时期作家一样,“关注结构,并且有能力处理材料,使材料服务于自己的写作目的。”^①

修辞学派的学者,特别是虽然修辞学派的研究从体裁方面证明李维在史料处理方面的特殊性,即他选择史料的目的性,但是却对史料研究学派的研究成果产生不了直接挑战。迈尔斯(Gary B.Miles)认为这一困境的原因是两方面的,“首先是史料研究学派和修辞学派分析的是不同的史料,探索的是不同的原因,关注的是不同的问题;史料研究学派关注李维的史料和分析方法,而修辞学派关注的是文体,这是史料研究学派不能论述的,主题问题也在史料研究学派的研究范围之外。这两个学派在他们各自面对的问题中几乎没有共同的地方。其次是修辞学派的分析不可能导致重开由史料研究学派截止的问题,其原因是修辞学派必须避免本身具有的局限。”^②修辞学派承认李维在文体和修辞的设计上具有创意,却否认他在内容方面的创新。

无论是史料的研究还是修辞学的研究,他们得出的结论都对李维作为历史学家的地位形成挑战。从史料方面来说,他被看作是典型的缺乏创意的只会模仿的罗马人,甚至还是某种程度的说谎者,最起码也是个二流的历史写作者。从修辞学方面来说,他只是一个文体家,缺乏历史意识。如果只对它们中的一项进行研究,显然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质疑他的历史学家的地位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面对李维学术研究方向的两个方向,卢斯主张重回把李维作为历史学家来评价之路。1977年,他出版新著《李维的历史编撰》(*Livy: The Composition of His History*)表达了这一观点。一位评论者在谈到这部专著对于李维研究的意义时认为:“这样的观念是卢斯教授这本新著的贡献。它建

^① George W.Houston,“Review of *Livy: The Composition of His History*”, by T.J.Luce, *Classical Philology* 75(1980), p.74.

^② Gary B.Miles, *Livy: Reconstructing Early Rome*,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2~3.

立在他超乎寻常的洞察力和对材料仔细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将对李维研究的未来方向产生深远影响。”^①卢斯首先反驳史科学派如威特尔提出的观点,即认为李维匆忙地从一个事件转到另一个事件,在写作前并没有统一的规划。^②他认为,李维开始写作时,对整部著作的规划便已了然于心,通过分析现存内容就可以发现,他以五卷为一个叙述单元,这样的结构在第1~45卷中非常明显,即使在第45卷以后,这一结构也很常见。^③其次,就史料问题,卢斯认为李维的处理方法是多渠道的,在必要的时候他对史料的重新整理和排列以及删减都是从一定的目的出发,对于李维来说,对史料的处理“并不是为了从其他的史料中选择最好的,而是要选择能够最好地保证叙述完整的史料。认为他把分散的材料组合起来形成自己的看法在李维那里是没有的。原因之一是这样的过程对于他来说无疑有不负责任和故意为之的迹象。即使假定一个作家是诚实的,而且以严肃和基本上公正的态度进行构建,又怎样证明他的说法是真实的?”^④因此对于李维有时在史料运用方面的混乱是可以理解的。卢斯认为,在史科学派的研究中,李维本身被忽视,这种倾向在史科学派垄断李维的学术研究时最为严重,他们认为李维的写作完全依赖于他用作史料的文学作品,在叙述中史料的描述顺序和过程,思想和表达的解释,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的用词和文体都是承袭他所引用的史料的。再次,就李维的文体方面,卢斯承认,他是一个优秀的文体家,也相信他的著作中修辞学的演讲、描述古代美德的插曲、戏剧性的场景和生动逼真的描写都是李维的贡献。^⑤但是认为李维对历史的贡献只在于单个场景和插曲的描写,显然是不恰当的。最后,卢斯还探讨了李维的历史观。他认为李维把罗马历史看成是逐渐成长、强大的,而不是像柯林武德所说的那样是“预设的和完整的”^⑥。卢斯相信,李维有意识地使他的历史叙述表现出这样一种趋势,即罗马在公元前2世纪早期,道德的衰退已初露端倪,而不是像撒路斯特所说的那样从第三次布匿战争开始。他引用了许多材料来说明这一观点。^⑦卢斯的研究成果在李维研究领域引起很大反响,可以

① George W.Houston,“Review of Livy: The Composition of His History”, by T.J.Luce, *Classical Philology* 75(1980), p.73.

② T.J.Luce, *Livy: The Composition of His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XVII.

③ T.J.Luce, *Livy: The Composition of His History*, p.7.

④ Ibid., p.144.

⑤ Ibid., p. XVII.

⑥ Ibid., p.232.

⑦ Ibid., pp.251~275.

说,自此以后对李维的研究或多或少都与卢斯的研究成果相关联。研究者沿着卢斯开辟的道路开始研究“李维为什么这样做?”^①

实际上,就在卢斯专著出版前后,研究者也关注到李维的写作目的,特别是他的写作是否服务于奥古斯都的统治。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也有两派观点,一派以塞姆(Ronald Syme)为代表,认为李维的写作直接服务于奥古斯都政权。塞姆在其著名的《罗马革命》中认为,李维的写作促成了奥古斯都的政策:“皇帝和历史学家彼此理解……李维、维吉尔和贺拉斯,所有这些奥古斯都的作家都与政府站在一起。”“正如其他的由政府鼓励的文学创作一样,李维的历史是爱国的、道德的和劝勉的。甚至对古物的爱好也有其作用。但是,历史没有必要像文物那样,它应该像诗歌那样颂扬古代关于勇气的记忆,复兴国家的自豪、用内在的美德教育下一代。”^②在长篇论文《李维与奥古斯都》中,塞姆对《建城以来史》的写作计划和结构、李维开始写作的时间以及奥古斯都的统治进行了详细探讨,认为李维接受了奥古斯都时代的政治变动,对政府及其成就持赞扬态度,整个叙述具有很强的道德格调,不像他之前的历史学家只为政治家提供借鉴,他的写作为普通人提供行为规范。正因为他写作的目的性,使他没有成为撒路斯特和塔西佗之间的连接人物。^③李维的历史写作目的与维吉尔、贺拉斯没有差别。达德利(Donald R.Dudley)与塞姆的观点相似,他说:“在这一时期(奥古斯都统治时期),文化艺术与政府的目的和理想相辉映。在现代世界,大批作家支持统治集团似乎是一个悖论……但是,奥古斯都的计划却给理想主义和热情提供了主题:战后和平、罗马和意大利的命运、过去的伟大、道德的复兴。这些理想部分或者全部表现在《埃涅阿斯纪》和贺拉斯的《颂歌》(*Odes*)中、在李维的历史与和平神龛的雕塑品中。然而,从狭义来说,奥古斯都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条件:作家能够发挥所长。他是一个文学的鉴赏人,……文学是奥古斯都时代罗马最具特色的艺术,……李维也不例外,因为他的著作也是一部散文史诗。‘历史几近于诗’是罗马最好的评论家做出的超乎想象的判断。”^④

另一派观点以 20 世纪 60~70 年代的学者们如沃尔什、卢斯等为代表,

① George W.Houston, "Review of Livy: The Composition of His History", by T.J.Luce, *Classical Philology* 75(1980), p.76.

② Ronald Syme, *The Roman Revoluti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9, pp.317~318, 463~464.

③ Syme, "Livy and Augustus", *HSCP*, Vol.64(1959), p.75.

④ Donald R.Dudley, *The Civilization of Rome*,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62, pp. 143~144.

他们不认为李维的历史写作目的是为了服务于政权。二战以后,学者们在研究李维的过程中,逐渐改变简单把李维的写作看作是对奥古斯都统治的歌颂的做法,把理性具体的分析引入到研究工作之中,既承认李维的历史叙述与奥古斯都时代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也强调李维写作的独立性。奥格尔维认为,李维尽管与“政权有着联系,但是仍然保持着独立的姿态写作”^①。佩特森(Hans Petersen)在其论文中说:“他在写作时心里装着他的时代,这一点已经非常清楚。还有一点很清楚的是,通过许多暗示,他想给他的同时代人以警示,特别是奥古斯都。他绝不是皇帝的宣传者,他的叙述表达了这样的思想:罗马人将不能忍受完全的专制王权。……按照塔西佗的观点,在那些优雅的天才(*decora ingenia*)之中,李维确实算得上一个奥古斯都时代写作历史没有奉承统治者的人。”^②

由于学者们多想证明李维作为历史学家的地位,因而在研究中试图证明李维的客观公正态度。沃尔什认为,李维无论如何比之前的撒路斯特和之后的塔西佗公正,因为他少了一份由于政治失意带来的愤懑。同时就李维写作的倾向,沃尔什的观点更加明确,他说:李维像维吉尔、贺拉斯等伟大作家一样都出生在共和国时期,当李维批评性地回顾了公元前29年奥古斯都返回罗马之前20年的政治混乱和野蛮时,“那些痛心的经历似乎已经成为一个格式化的东西,它激起了文学方面的爱国情绪的增长。特别是第一个‘十卷’中的情绪与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是一致的,它的中心观念即罗马作为一个最光荣的国家(*pucerrima rerum*)主宰着这两部著作。他们俩都把城市看作是神建立的,而且受到神的指导;两人都强调皇帝的使命是在有人居住的世界建立罗马的和平(*Pax Romana*),非常明显,这样的爱国主义的情感是奥古斯都自己提倡鼓励的。……但是宣称李维用他在历史写作方面的天才服务于政权则是不同的事情。经常有这样一种观点:即他只不过是一名宣传者,他的叙述是介绍普林斯制(Principate)。还有一些人走得更远,甚至说李维描写的罗慕路斯、赫拉克利斯、努马等都是暗指奥古斯都,以暗示他的神性。在别的地方,我们还能读到这样的观点,在他的前言中,他赞同奥古斯都提议的社会和政治改革。另一名学者还宣称,历史学家描写的西塞罗表明奥古斯都在一定程度上掌控了他的思想。无论什么证据都不能说明李维是奥古斯都的代言者,也许这样的观点来源于塔西佗宣称

^① R.M.Ogilvie, “Introduction”, *Livy: Rome and Italy, Books VI ~ X of the History of Rome from Its Foundation*, Penguin Book, 1982, p.11.

^② Hans Petersen, “Livy and Augustus”, *Transaction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 vol.92(1961), p.452.

的亚克兴战役以后不存在公正的历史叙述有关。但是,直言的历史学家如科尔都斯(Cremutius Cordus)为皇帝所容忍。对于李维来说,完全有自由写作他想写的东西。”“真实的情形是:李维像所有其他的历史学家一样,绝没有把过去和现在分开。在描述与他的时代有一些相近的历史事件时,他的耳边就会下意识地出现现在的事件。但是,除此之外,认为李维是一个政权的宣传者,通过把奥古斯都确认为历史上的传奇英雄,既不能证明也是不合理的。……因此,李维与奥古斯都保持了四十年的友谊,对奥古斯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但同时又保持独立的写作以解释过去。”^①沃尔什极力证明李维的历史写作是在无意识中与奥古斯都统治的意识形态相吻合,而不是有意成为政权的代言人。卢斯则更坚定地认为李维是作为历史学家在写作,而不是有意迎合奥古斯都政权,他说:“前五卷……不管在精神上还是在运作上都不能称作‘奥古斯都的’;它的写作时间在屋大维被授予称号之前很久,也在奥古斯都的政策和计划实施之前。真实的情况是,学者们认为的对皇帝和他的统治的暗示的所有的这些段落是缺乏说服力的;一些解释也是极端的不可靠。许多内容与30年代前后的情形十分吻合。……确实,在前五卷中许多地方李维的观点与奥古斯都的宗教、社会和道德改革计划一致。但是这些改革计划有许多是在李维的前五卷已经出现以后才有的……与其在李维的历史中寻找对奥古斯都的暗示,还不如去研究李维关于过去的观念在多大的程度上影响了奥古斯都的政策将更加有益。”^②通过比较奥古斯都广场上英雄们雕像的铭文内容和李维记载的这些英雄们的事迹,卢斯得出结论,奥古斯都在确定碑铭时并不是参考李维的历史,“我不相信李维认为奥古斯都的功绩超过罗马历史上所有的伟人(*summi viri*)的成就,也不相信李维把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已经到达了发展的巅峰。……皇帝与历史学家之间的友谊并不是如有些人所说的那样亲密和意气相投。”^③

沃尔什和卢斯的观点在很长一段时间影响了李维与奥古斯都关系的研究方向,保罗·勃雷东(Paul.J.Breton)的研究成果就是一个例子,在其论文的开篇,他说:“这篇论文阐述了一个在李维研究领域的一个非常带有技术性的问题,它对于正确理解《建城以来史》的意识形态要旨非常关键。它的

^① P.G. Walsh, *Livy: His Historical Aims and Method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3, pp.10~14.

^② T.J.Luce, “The Dating of Livy’s First Decade”, *Transactions and Proceeding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 Vol.96(1965), pp.238~240.

^③ T.J.Luce, “Livy, Augustus, and the Forum Augustum”, *Between Republic and Empire*, Kurt A.Raaflaub and Mark Toher ed., Berk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pp.137~138.